



中西文化 对比研究

编著／杨密



新华出版社

中西文化 对比研究

编著 / 杨 密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西文化对比研究 / 杨密编著. —北京:新华出版社, 2014. 9

ISBN 978-7-5166-1227-9

I. ①中… II. ①杨… III. ①比较文化—研究—中国、西方国家 IV. ①G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22742 号



中西文化对比研究

作 者:杨 密

出 版 人:张百新

责 任 编 辑:王晓娜 梁秋克

封 面 设 计:天一文化

出版发行:新华出版社

地 址: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邮 编:100040

网 址:<http://www.xinhua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经 销:新华书店

购书热线: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010-63072012

印 刷:河南承创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85mm×260mm

印 张:14

字 数:247 千字

版 次:2016年 5月第一版

印 次:2016年 5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66-1227-9

定 价:54.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4006597013

前 言

PREFACE

经济全球化以及现代信息技术的日趋发达已经将世界各国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各国人民仿佛在共同创造和分享着财富。纵使人们远隔千万里,依然能够实现信息交流和资源共享,地球俨然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地球村”。然而,面对越来越频繁的交往活动,我们不得不认真思考:人类的交往能够孤立地进行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交往本身必然和人类的其他活动交织在一起,而不可能孤立地存在。文化是人们从事交往活动时不可缺少的“纽带”,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人类交往所结成的便是一种“文化关系”。

当今世界,国家交往中,日益重视文化的影响力已成了一种新型的国家关系表征。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实质上已经演变为硬实力与软实力的较量。从历史的发展来看,通常在国家交往中硬实力被强调得更为突出;然而在当今社会,渐渐演变成了两者并重,甚至有的国家已经开始把软实力的提升作为增强其对外影响力的一个重要举措。由此,对中西文化进行科学的比较是十分必要的。这种比较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从更为现实的角度出发,这种比较则具有更加紧迫的意义。

首先,对中西文化的比较能够进一步使我们对如何进行文化交往做出更加理性的判断和选择。如果对中西文化的差异没有足够清楚的了解,在文化交往中不可避免地会闹出很多笑话,从而影响交往的有效性。每种文化都不是天上掉下的怪物,文化与文化之间首先表现出来的是多方面的“异”,它们有着只属于自己的“源与流”,都有其独特的基因和传承关系,理清这一点是极为重要的。俗话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实际上,这里的“水土”就包含了丰富的文化因素;这同时说明,每个人都是一种特定的文化哺育下成长的。由此也可以说,一方文化养育一方人。因此,这种比较为我们进一步了解和学习中西文化提供了一种参照,提高我们对中西文化的理性认识。

其次,有助于进一步增强我们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改革开放以来,文化界曾经历过一段盲目、浮躁、肤浅地谈论和引进西方文化的时期,其直接后果是变相地忽略了对中华文化的研究,也影响了对西方文化的进一步借鉴。部分中国人认为西方的月亮比中国的圆,一种文化自卑心理就应运而生了。其实,通过比较我们便会发现,每种文化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套体系,其中都蕴含着自身的内在智慧。文化离不开人的创造,它们本身所凝聚的也是创造者的智慧。每一种文化都有其内在的生命力和优越性。从深层次看,世界各国人民的智慧实际上是相通的,国家、民族、种族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文化之间是平等的,只是各自的发展历程和表现形态有所不同而已。对不同文化的比较可以增加对其他文化的了解;同时,通

过这种比较,我们还能够全面深刻地认识到中华文化也属于世界优秀文化之一,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我们既无必要妄自菲薄,更无必要妄自尊大。

再次,有助于我们正确地认识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文化创新的重要作用。毋庸置疑,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勤劳智慧、勇于创新的民族,曾经为世界的发展做出许多伟大的贡献。然而由于各种各样的历史和现实原因,中国在一些方面已经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如果我们还不能以清醒的文化创新意识和紧迫感发展中华文化,以增强民族文化的活力和生命力,我们将只能停滞不前,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不愿意看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现在只能以一种“追赶者”的姿态与世界“接轨”和“对话”,“等不是办法”,我们必须重新拿出文化创新的勇气,增强文化创新的自觉意识。

最后,有助于我们正确把握各种文化的本质和精髓,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提供一种借鉴。有比较才有鉴别,我们应该学会“拿来”,借助这个国际交往、种族交往、民族交往日趋密切的大平台,为中华文化的发展补充丰厚的营养,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近年来,中国也在世界很多国家和地区陆续开办了孔子学院和互办“文化年”活动,这表明中国实际上也正在积极探索如何借助软实力以增强国家影响力。在此过程中,作为最大知识群体的大学生,特别是当代大学生,既有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又有参与中西文化交流的现实责任。因此,如何让他们增强自身的文化素养,提高他们的文化辨别力是大学教育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中西文化都有其各自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和源远流长的历史背景,大学生很难把握中西文化的精髓。鉴于此,本书将首先从纵向上梳理中西文化各自的诞生“土壤”、发展历程及相互差异,然后着重从横向剖析比较中西宗教、哲学、封建制度、文学、艺术、教育、科技、民俗等方面,希望有助于大学生对中西文化差异有一个大致了解。

本书力求以比较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到中西文化的各个方面,对其进行科学的比较,方便高校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和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本专科学生、研究生以及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学习。

目 录 / 01

| | |
|------------------------|-----|
| 第一章 孕育中西文化的沃土 | 001 |
| 第一节 文明的起源 | 002 |
| 第二节 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 | 005 |
| 第三节 分封制与城邦制 | 008 |
| 第二章 中西文化的发展轨迹 | 015 |
| 第一节 春秋战国时期与古希腊罗马时代 | 015 |
| 第二节 中华文化的繁荣时期与黑暗的中世纪 | 017 |
| 第三节 资本主义萌芽时代与文艺复兴时期 | 021 |
| 第四节 封建帝国的衰落时期与启蒙运动 | 023 |
| 第五节 19世纪的中西文化 | 027 |
| 第三章 中西社会制度的发展历程 | 031 |
| 第一节 中西社会形态的演变 | 031 |
| 第二节 中西社会的统治结构 | 036 |
| 第三节 中西社会的国民命运 | 042 |
| 第四章 中西哲学比较 | 048 |
| 第一节 中西哲学的发展脉络 | 048 |
| 第二节 中西哲学的思维方式 | 052 |
| 第三节 中西哲学的聚焦内容 | 058 |
| 第五章 中西宗教的差异 | 066 |
| 第一节 中西原始宗教及其基本构成要素 | 066 |

目 录 / 02

| | |
|----------------------------|------------|
| 第二节 儒教与道教 | 069 |
| 第三节 本土化的佛教 | 075 |
| 第四节 西方宗教——基督教 | 077 |
| 第五节 中西宗教的对比 | 078 |
| 第六章 中西文学比较 | 084 |
| 第一节 中西神话比较 | 084 |
| 第二节 中西诗歌比较 | 087 |
| 第三节 中西散文比较 | 091 |
| 第四节 中西小说比较 | 097 |
| 第五节 中西戏剧比较 | 101 |
| 第七章 中西艺术表现差异 | 108 |
| 第一节 中西绘画艺术的不同表现 | 108 |
| 第二节 中西音乐艺术对比 | 113 |
| 第三节 中西雕塑的差异 | 118 |
| 第四节 中西传统建筑艺术对比 | 124 |
| 第八章 中西教育观念的差异 | 129 |
| 第一节 中西教育思想 | 129 |
| 第二节 中西方学校教育制度的发展 | 130 |
| 第三节 中西教育传统差异 | 137 |
| 第四节 孔子与苏格拉底 | 143 |

目 录 / 03

| | |
|-----------------------------|-----|
| 第九章 中西科学技术发展 | 149 |
| 第一节 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及其成就 | 149 |
| 第二节 西方古代科技的发展及成就 | 159 |
| 第三节 近代以后西方科技的进步及中国的落后 | 162 |
| 第四节 中西科技的比较及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分析 | 167 |
| 第十章 中西文化习俗的差异 | 171 |
| 第一节 中西称谓分析 | 172 |
| 第二节 中西婚礼仪式比较 | 176 |
| 第三节 中西节庆文化的比较 | 180 |
| 第十一章 中西文化的突出差异 | 186 |
| 第一节 无神文化与有神文化 | 186 |
| 第二节 德性文化与智性文化 | 193 |
| 第三节 和谐文化与对抗文化 | 197 |
| 第十二章 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 200 |
| 第一节 文化交流 | 200 |
| 第二节 文化冲突 | 207 |
| 第三节 扬长补短,兼容并蓄 | 211 |



第一章 孕育中西文化的沃土

人是文化的动物。难怪连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莱特都曾感慨万分道：“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①文化是人之所以比其他动物高贵、伟大的本质特征。否则，“这一个泥土塑成的生命算得了什么”，不能让哈姆莱特发生兴趣。

劳伦斯·罗威尔曾说：“我被托付一项困难的工作，就是谈文化。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别的东西比文化更难捉摸。我们不能分析它，因为它的成分无穷无尽；我们不能叙述它，因为它没有固定形状。我们想用文字来界定它的意义，这正像要把空气抓在手里似的。当我们去寻找文化时，除了不在我们手里以外，它无所不在。”^②虽然文化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最重要的特征，但关于文化的概念，学者们却众说纷纭。有的学者从文化现象去归纳（如泰勒、博亚斯、林顿、克罗孔、凯利、克鲁伯等），注重文化的整体性和文化内容的主要方面；有的学者从历史角度去考察（如巴尔克、波尔格斯、萨皮尔、博斯、梅德等），强调文化的特色、社会遗产和传统；有的学者从文化的规律、文化中的理想与价值去定义（如卡富尔、汤玛斯、比得尼等），认为文化是支配一个社会的物质的和社会的价值；有的学者从文化产生的条件去概括（如温斯顿、华尔德、太洛尔等），把文化看成是在每个人群中产生的、超乎个人之上的应用行为；有的人从心理学去观察（如史莫勒、克茨、施恩克、福尔特、莫利斯等），探询文化发生的心理因素；还有的学者从文化的结构去追寻（如维利、寇图等），将文化当作一个抽象的构造加以分析。有学者曾统计，从 1871 年至今，有关文化的有代表性的定义不下 200 种。为了阐述的方便，在本书里，笔者认为，文化就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创造的一切物质、精神财富，其结构可分为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两部分。其物质层面指的是人们为满足生活必需所创造的物质产品，其精神层面指的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建立或形成的社会制度、民风民俗、观念

^① [英]威廉·莎士比亚：《哈姆莱特》，朱生豪译，《莎士比亚全集》第七卷，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 46 页。

^② 张忠利、宗文举：《中西文化概论》，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 1 页。

心态等。文化的发生、制约因素很多,自成一个系统,主要有九大要素:生态、环境横向决定律,语言文字纵向诱导暗示律,科技、工具、媒介横向催变律,物欲原动力律,情欲原动力律,权欲原动力律,审美递增、递减律,阴阳二极对立转化律,万物五相(行)选择律,它们会导致文化在不同的层面上发展。^①

自起源至今,人类历经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创造了丰富的文化内容,而“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是“最广泛的文化实体”^②。因此,本书所论及的主要是人类文明时代的中西文化。

本书中中国文化,是指中华民族创造的文化。西方文化,是指欧、美文化。中西文化是世界文化中两个根本不同的体系,无孰优孰劣之分,都是在各自特定的环境、社会中协调、组织、规范的结果,是在诸多动态的因素系统中得到的各自最好的存在方式,它们都是合理的,中西文化的差异是由孕育它们的土壤决定的。

第一节 文明的起源

中西文化的起源经历了非常相似的历程。

在《古代社会》里,摩尔根按照人类生活资料、生产的进步,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每一时期都有高、中、低三段。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基本沿用此种分期。中西文化的起源都经历了这些分期。蒙昧的低级阶段是人类的童年时代,人类以采集果实、块根为食,产生了分节语言;中级阶段又称旧石器时代,人类有了狩猎活动,能打制粗糙的石器,并形成以血缘为纽带的母系氏族公社;高级阶段又称新石器时代,人们能磨制比较精美的石器,制作木制容器、房屋,开始定居并形成村落,发明了农业、畜牧业,其中农业的产生是人类历史上一次巨大的革命。野蛮时代的低级阶段是母系氏族制度的全盛时代,女性在氏族中具有很高的地位。人们发明了制陶术,开始驯养动物、种植植物;中级阶段又称青铜时代,人们发明了冶炼术和金属加工,铜器的出现促成了第一次大分工(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产生了交换制度。氏族公社的解体使得父系氏族制度取代了母系氏族制度,男子在农、牧业中占据重要地位,一夫一妻制的家庭与氏族有了对抗。随着私有制的出现,剥削产生了;高级阶段已使用铁器,文字的出现促成了第二次社会大分工(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出现了商品生产和金属货币。在这个时期,个体家庭成为社会

① 辜正坤:《中西文化比较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26—227页。

②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24—26页。



的经济单位,奴隶主也随之出现。公元前 4000 年,文明时代首先在四个分散得很遥远的地区独立兴起,即尼罗河流域、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下游、印度河流域、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国家也出现在这四大文明发祥地,城市越来越成为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形式。社会上有了劳动分工,产生了知识阶层,而政治、宗教上的等级结构也形成。

中国文化发源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在云南省发现的“元谋猿人”距今约 170 万年,是我国境内已知的最早的人类,在陕西发现的“蓝田猿人”距今约 80 万年,在北京周口店发现的“北京猿人”距今也有 60 万年左右,这些都是直立猿人,已经大量使用石器并能人工取火。考古发现的广东马坝人、陕西大荔人、湖北长阳人、山西丁村人、内蒙古河套人、广西柳江人、北京山顶洞人等都是智人,距今约 20 万年,他们已经进入氏族公社阶段,能打磨比较精致的石器,并逐渐发明制造陶器、铜器,农耕、家庭也出现了。无论是黄河流域文明,如裴李岗文化(河南新郑,距今约 8000 年)、仰韶文化(河南渑池,距今五六千年)、大汶口文化(山东泰安,距今 5000 年左右)、龙山文化(山东章丘,距今四五千年)、马家窑文化(甘肃,距今四五千年)、齐家文化(甘肃政和,距今 4000 年左右)、二里头文化(河南偃师,距今约三四千年)等,还是长江文明,如河姆渡文化(浙江余姚,距今约 7000 年)、马家浜文化(浙江嘉兴,距今五六千年)、良渚文化(浙江杭县,距今四五千年)、屈家岭文化(湖北京山,距今三四千年)等,它们都是人们战胜挑战的崭新创造。由于没有先例可循,只能在摸索中前进,付出了很大代价。

西方文化亦如此。西方文化的发源地是古代希腊。黑格尔曾说:“一提到希腊这个名字,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尤其是在我们德国人心中,自然会引起一种家园之感。……今生,现世,科学与艺术,凡是满足我们精神生活有价值、有光辉的东西,我们都是从希腊直接或间接传来的。”^①根据希腊的神话传说,希伦(Hellar)是盗神火给人类的普罗米修斯的孙子。公元前 7 世纪前后,希伦逐渐被希腊各民族看作他们共同的祖先,开始自称为“希腊”(Heladus),意思是希伦人居住的地方。古代希腊,包括希腊半岛、爱琴海诸岛和小亚细亚西部海岸。希腊半岛是古希腊的主要领域,东临爱琴海,西接爱奥尼亚海。整个半岛山脉纵横,五分之四是山地,土地贫瘠,河谷里的小块土地是唯一适合耕种的地方,荒凉的山坡把平原分割成块,使得陆路交通极其不便,近海连鱼都不产,人们面对的环境十分恶劣。尽管如此,那里旧石器时代就有人居住,公元前 3000 年克里特岛进入青铜时代,公元前 2000 年左右建立了城邦国家,公元前 1500 年出现了迈锡尼文明。由于地少人多的矛盾,公元前 11 世纪开始,半岛上的居民逐渐大规模地向外移民,足迹遍及爱琴海地区,真正意义上的希腊文明由此拉开序幕。

^①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年,第 157 页。

综观中西文化的起源,正如汤因比所说:“原始社会可以比作一群人,他们正迟钝地躲在山腰的突出的岩石之上,它的上面是绝壁,下面也是绝壁。文明社会可以比作是这些睡觉的一群人,他们刚刚站立起来,并且开始攀登上面的悬崖峭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四卷)

但中西文化在起源上存在许多不同。

第一,文明的起点不一样——早熟的儿童与正常的儿童。

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它的第一次出现以定居、葬礼、私有制、职业分工、远距离交易、技术革新和战争等为标志。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最迟在公元前21世纪,黄河流域中部的夏部落在禹的率领下治水安民,打败三苗,确立王位世袭制,自认为居天下之中,称“中国”,开始跨入文明时期。换句话说,中国文化早在新石器时代就进入了文明时期。通过考古发现,不论是仰韶遗址还是陕西半坡遗址,都有大量的绘着彩色花纹的陶器,而龙山文化的陶器制作精美,黝黑发亮。这时,人们能够打制铜器,由渔猎发展到了农业种植,早先的部落聚集变成以家庭为单位的定居,先是女性后是男性在家庭中占据重要位置,私有观念开始出现。

西方文化到了铁器时代才进入文明时期。恩格斯说:“铁器时代,但同时也是铁犁和铁斧的时代。铁已在为人类服务,它是在历史上起过革命作用的各种原料中最后的和最重要的一种原料。……铁使更大面积的田野耕作,广阔的森林地区的开垦成为可能;它给手工业工人提供了一种极其坚硬的锐利非石头或当时所知道的其他金属所能抵挡的工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从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和考古发掘的材料看出,那时人们普遍使用铁器,农业生产力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采用的许多农具和耕作技术都比较先进,为生产关系的解放创造了物质条件。在手工业中已有了织、酿、陶、木、皮、铁等多种行业的分工,货币媒介开始出现,商业交换也有所发展。荷马史诗中详细描述了克利特岛上克诺萨斯城的繁荣情景:王宫结构复杂,千门万户曲折相通,拥有复杂巧妙的给排水系统,墙壁、器皿上绘制着美丽的图画;与此同时,自然经济开始衰落,地方的利益关系已在逐步代替从前的血缘结合,从而使原始的氏族制度濒于解体,贵族占据越来越多的财富,并把大量的战俘变成奴隶,终于形成奴隶制国家。所以马克思说:“有粗野的儿童和早熟的儿童。古代民族中,有许多属于这一类。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两者在旧传统瓦解、劳动分工、阶级分化、商品经济、社会发展速度及水平等多方面存在差别。

第二,地理条件不一样——大陆田园式与海洋岛屿式。

正如列宁所说:“地理环境的特性决定着经济关系以及随在经济后面的所有其他社会关系的发展。”(《列宁全集》第38卷)在中国黄河、淮河流域平原上,土质疏松,气候温和,雨量



充足,农耕和畜牧发展很快,形成了最早的部族联盟国家。在它们的东北部是燕山山脉,南部则是起伏连绵的桐柏山、大别山,西部为太行山脉、秦岭、大巴山,东临浩瀚的太平洋。中国文化的根基由此奠定。此后,无论是战国七雄之一的秦国吞并天下,还是汉、唐帝国的建立,抑或是宋、元、明、清等泱泱大国的延续,其地理环境总摆脱不了远古时的半封闭的大陆特性。具体地说,疆域辽阔,位于世界第三,大部分领土处于北温带,中纬度,气候温和,被黑格尔誉为“历史的真正舞台”。东临沧海,西北横亘广大的荒漠,西南耸立着“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和人迹罕至的横断山脉,南部是茫茫印度洋;地处大河流域,有肥沃的冲积谷地,内陆多山,宽阔的高原和崇山峻岭交错,山地、高原和丘陵约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 65%,地理环境相对封闭。

而地处欧洲南部的希腊半岛则三面环水,海岸线有 3000 多英里^①,多岛屿,其资源是渔业、商业。东海岸的爱琴海地区北到色雷斯、南到克里特、东达塞浦路斯,散布着 480 多个岛屿,都有良好的避风港。

第二节 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

孕育中国文化的沃土是持久的农耕经济,而西方文化发展的背景却是发达的海洋贸易,这种差异使中西民族及其文化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中国一向有发展农业的优良条件。对于远古时代的原始人来说,在无法逾越的内陆式天然屏障之中,气候温和,雨量充足,土地肥沃,河流众多,最适宜于发展原始农业。此后,随着疆土的不断拓展,内陆式的格局一直没有改变过。三面高原一面海的地域特点,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环境,孕育了中国农耕经济的形态。

早熟性是中国农耕经济的首要特点。人们很早就在农具的创造使用、集约耕作、粮食作物的驯化培育等方面取得突破性的成果,至少在魏晋时就形成了一整套精耕细作的方法。

远古时候,最初人们是用石斧或砍伐器砍倒树木,放火烧掉,再用尖木棒等松土、播种,收获时用石刀、蚌镰掐穗。新石器时代人们在松土用的尖木棒下部绑上短横木,便于翻地时脚踩助力,称为耒。单齿木耒翻地面积小,人们就将单齿变为双齿,耒齿改成板状刃,使翻地效率大大提高,称为耜。耜冠由木制逐渐变为石、骨、蚌。青铜时代农具发展更快,有钁、铲、锄、镰等。商朝发明了牛耕的方法。春秋时期普遍使用铁器,牛耕进一步推广,常见的农具有钁、铲、锸、锄、镰、犁铧、耙等,大都坚硬、锋利、耐用;普遍使用了桔槔、辘轳等灌溉方法。

^① 1 英里 = 1609.344 米。

汉朝的铁农具、牛耕更加普及并进一步改进,计有镰、锥、犁、锄、枷、锸、耙、耨、搏、铚等多种,不仅有全铁制的犁铧,而且犁铧上还装置了犁镜(又称犁壁、壁土),使破土和翻地能力大大增强;二牛三人的耦耕得到推广,出现了二牛一人犁、一牛双辕犁等新的牛耕方法;已经发明能同时播种三行的“三脚耧”(又叫耧车),将开沟、下种、覆土的工序一次完成;发明了翻车,并不断加以改进,成为有效的戽水机械;用连枷、扬扇收获粮食,用石磨加工谷物,后又发明了水碓、连磨、水碾等工具用来碾米磨面,现在还在沿用。唐朝发明了曲辕犁,不但节省畜力,还提高了耕地效率。至此,我国的耕犁技术已基本定型;同时有了大型提水灌溉工具,水转筒车、高转筒车,利用水力推动,将水提到十多丈高的地方,灌溉农作物。宋朝发明了用于水稻插秧的秧马,可大大减小劳动强度,提高插秧速度。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作物起源中心之一,许多农作物是我国人民最早从野生植物驯化选育而成。新石器时代人们的主要粮食作物是粟、稻,此外还有麻、高粱。粟,又叫谷子,脱壳后就是现在人们喜欢吃的保健食品小米,是黄河流域的人们从野生的狗尾草中培育出来的,耐旱、自生能力强。稻,一般称水稻,是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的人们从野生稻培育而成,成为当地人们主要的粮食作物。商、周时期,我国的农作物品种显著增加,除粟、稻外,还有黍、菽、麦、稷等,基本上包括了后世的主要农作物。汉朝的粮食作物品种就更多了,仅中原就有粟、黍、稷、高粱、大麦、小麦、粳稻、林稻、大豆、小豆、麻籽等。

蔬菜是食物组成的重要部分,古人早就知道其重要性。《诗经》中提到了132种植物,其中有24种人们作为蔬菜食用。到汉代时形成5种最主要的蔬菜:葵(今称冬寒菜)、藿、薤、葱、韭,后两种至今仍作为蔬菜广泛食用。至宋朝,还培育出人们至今仍喜欢食用的茭白、白菜等。

持续性是中国农耕经济的第二个特点,从最初利用优越的地理环境发展农业,一直到现在都以农业为经济主体。远古人们就把农业与部族的兴衰联系在一起,传诵的贤人、能人都以农业为怀孜孜以求的人。《诗经》中众多诗篇反映了先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繁忙景象,人们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是农耕。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纷争,列国竞雄,为了求生存,纷纷实行改革,其中最显著的就是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如管仲“相地而衰征”的策略为齐国的强盛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魏国李悝的“尽地力之教”为列国仿效,商鞅的“耕战”政策使原本弱小的秦国发展壮大。秦汉以后,大一统的中华帝国一直把“重农固本”奉为治国的不易之道。

多元性是中国农耕经济的第三个特点。在农耕经济内部存在着多种经济成分,如游牧、手工业、商业等。早在汉代,司马迁就记录了当时农耕经济的多元化结构:“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徵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



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这种情况在各个朝代都延续着。

中国的商品经济发展很早，在先秦的典籍中就有商品交换、市场流通的记载，如《尚书·酒诰》鼓励百姓“纯其艺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长，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诗经》中也有大量关于商品贸易的信息，如“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卫风·氓》），“如贾三倍，君子是识”（《大雅》）。秦汉的大一统时期，商业兴盛，“自京师东西南北，历山川，经郡国，诸侯富大都，无非街衢五通，商贾之所臻，万物之所殖也”^①。但中国的商品经济一直是农耕经济的一种补充形式，历朝政府都奉行“重农轻商”政策，使商品经济的发展缺乏独立性，呈现出随着社会变迁波浪式前进的特色，往往是农耕经济比较繁荣、社会政治比较清明之时，商品经济也随之繁荣，当农耕经济步入低谷、政治腐败混乱时，商品经济也不景气。

海洋贸易也是农耕经济的补充。中国早就有出色的航海能力，如唐宋时期，东南沿海有“海上丝绸之路”，“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国，不可胜用”^②。广州、泉州等沿海城市是闻名世界的贸易港口，经济十分繁荣，但其背后却是政治需要多于经济需求，一方面政府不计经济得失，将大量物品“赐”予海外，以便夸示泱泱大国的强大，对外商不予征税；另一方面商品贸易主要为满足上层贵族对于国外奇珍异宝的好奇，一般与广大民众的生活需求联系较少。又如明代中叶后，东南沿海私人对外贸易发展很快，其收入在经济结构中占有相当比重，其中尤以福建郑成功家族的海上势力最为强大，但政府对私人海商的发展予以不断地扼杀和控制，使其发展受到种种束缚，而对移居海外的商人，政府无一例外地采取歧视态度。

与中国相反，古希腊具有得天独厚的海洋贸易条件。沿岛海岸线曲折，多良港，岛内森林茂密，能为建造航海船只提供优质木材。通过航海，极易同当时文化先进的东方国家接触，从希腊半岛往东到小亚细亚不过50公里，登陆即可到达巴比伦；西海岸的爱奥尼亚海也利于航海，向南渡过地中海即达埃及。因此克里特人常常驾着单桅海船，载着各地货物，往返于地中海。顺利的时候是商人，穷途末路时是海盗。《奥德赛》中，国王涅斯托尔客气地问奥德修斯的儿子：“你是商人还是海盗？”可见两者同是当地人尊敬的职业。

公元前8世纪—前6世纪，希腊社会进入了奴隶制形成时期。此时，希腊各地的社会生产力有了普遍的增长，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铁矿的开采，冶炼和铸铁技术的普及，使造船业最为发达，已出现使用200多名水手的三层桨座的远航船舶^③，大批的职业商人出现，希腊成为商业贸易的中心。随着城邦的兴起和殖民运动的发展，希腊的政治、经济和城邦，曾经

① [汉]桓宽：《盐铁论·力耕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31页。

② [唐]韩愈：《送郑尚书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3页。

③ 该种船又称为“三列桨战船”。

扩展到东至小亚细亚、叙利亚，西至意大利南部的西西里岛，南至埃及、利比亚北部，北至爱琴海北岸和黑海这样广大的区域，甚至今天法国的马赛和西班牙的部分地区，都有过希腊的移民和城邦，可以说古代希腊的地域差不多包括了地中海沿岸的全部。地域扩大，海岸线更长，商人和海盗活动的区域更广，更促进了海洋贸易的快速发展。黑格尔曾说：“水性使人通，山性使人塞；水势使人合，山势使人离。在西半球的北温带濒海形成了一个大陆，正如希腊人所说，有着一个广阔的胸膛。”^①海洋性文化直接孕育了西方特色的科学文化。

第三节 分封制与城邦制

一、含义

分封制由周人创立，即封建（封邦建国制的简称），是中国历代社会结构的核心内容之一，与嫡长子继承制、宗庙祭祀制共同作为中国的宗法制度。

周代贵族依惯例实行一夫多妻制，其中有一个正妻，即“嫡”，所生子为“嫡子”，正妻外的其他妻子为“庶”，所生子为“庶子”。父亲死后，家庭中众多儿子往往为争夺父亲的一切不惜相互残杀。为避免这一惨状，周公规定：最高统治者称天子，统治天下的土地和臣民，继承王位的必须是嫡妻长子（不考虑其贤能与否），如果嫡妻无子，则立级别最高的庶妻之子（不考虑是否年长），即“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这一规定很快在家庭、各地政权中推行开来。周人创立分封制的出发点和目的是“封建亲戚，以藩屏周”^②，就是将同姓（即同血缘）的子弟、亲属封为地方邦国首长，用血缘这一纽带将各地联系起来，作为保护周王室的屏障。分封制的具体内容，最初为“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③。全国贵族按照与天子血缘的远近分为四个层级：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各层级被赋予的权力呈倒金字塔形，并对上一级有一系列义务。当时“天子有田以处其子孙，诸侯有国以处其子孙，大夫有采以处其子孙”（《礼记·礼运》）。天子把自己的王位传给嫡长子，而把其他的儿子分封到各地，通过特定的仪式由司空授土、司徒授民后，这些儿子就掌管一个个的地方邦国，称诸侯，诸侯对天子必须朝聘、进贡、出兵役劳役等，天子对诸侯有巡狩权、命官权、迁爵权等。诸侯的嫡长子成为诸侯，其余儿子按照天子的办法分封成为卿大夫，卿大夫的领地称为“采”或“邑”；卿大夫也照样分封士，士则靠自己的技艺、本领为卿大夫服务。

周代以后，分封制在历代虽受过冲击，但一直都不同程度地得到保留。周之后，姬姓家

①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124页。

② [春秋]左丘明：《左传·僖公二十四年》，王珑燕译注，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第27页。

③ [春秋]左丘明：《左传·桓公二年》，王珑燕译注，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第34页。



族的统治虽灭亡,可其他家族的统治相继而起;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经废除分封制,建立公卿制,但仍然牢牢地把持核心权力;刘邦当了皇帝后,与部下约定:“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即使看到刘濞面带反相也照封不误,将权力掌握在刘氏家族手中。分封制使历代君王都大封同姓王,使古代政治具有突出的家天下的特色,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家族史,我们可以把历代王朝称为刘氏汉朝、司马氏晋朝、杨氏隋朝、李氏唐朝、赵氏宋朝、朱氏明朝、爱新觉罗氏清朝等。分封制深深扎根于民众心中,即使改朝换代也要找一个皇室后裔为旗帜,如西汉末年的农民起义反对王莽新政,都纷纷寻找刘氏家族的人,结果,绿林军找来刘玄,赤眉军找来刘盆子。小说《三国演义》再现东汉末年魏、蜀、吴鼎立的历史,将刘备写成十全十美的明君,而将曹操刻画成奸诈的窃国之贼。小说深受人们喜爱,就是因为作者和读者都认同汉朝是刘家的天下。历朝不少皇帝也为分封与否伤过脑筋,甚至犹豫徘徊,各地封王反叛之事也时有发生,但最终都没有动摇分封制的实行。

西方则截然不同。由于自然条件的关系,古希腊的人们长期过着游牧、游耕、半游牧、半游耕的生活。公元前8世纪—公元前6世纪,铁制农具和畜耕技术得到普及,希腊人才开始定居农耕生活,这比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人晚了三四千年。就在此时,以城市为中心的城邦国家出现了。据亚里士多德的记载,这个时期,在希腊本土和殖民地共兴起了200多个城邦国家,后逐渐增加到600多个,每个面积不过一二百平方公里。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米利都、爱菲斯、科林斯、麦加腊、提比斯、阿里斯以及后来成为希腊两个最大城邦的雅典和斯巴达。其产生原因在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铁器为农业、手工业的生产提供了更多、更好的工具,人们能依仗个体的生产能力得以生存。生产规模亦不断扩大,特别是造船、冶金和制陶工业发达,出现铸币并日渐普及。土地私有制日益确立并集中在氏族贵族手里,剥削日益加重,奴隶制遍行于希腊社会。工商业的发展形成了新的工商业奴隶主,财产关系代替了旧日的氏族关系。城邦的建立,与古希腊的岛屿环境密切相关。希腊文明分散在数百个大小不一的岛屿中,当岛屿人口增多后只有出外冒险,对外移民、扩张,因此血缘关系相对松散,而周边又没有强大的邻邦为敌,没有什么生存危机,也就没有政治统一的要求。

城邦(polis),在荷马史诗中是指堡垒、卫城,后变成一种社会组织,它的一般含义是“为了要维持自给生活而具有足够人数的一个公民集团”,“若干公民集合在一个政治集团以内,就成为一个城邦”,其“最高统治权一定寄托于‘公民团体’,公民团体实际上就是城邦制度”^①。它是第一代国家形态,具有市、机构和公民大会三个要素。在西方语言中,许多政治术语都来自城邦,如政治学(politics)、政治的(potitical)、政体(polity)等。

^①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75—1278页。